

# 浅论《三国志注》的历史文献学价值

陈楠

(吉林省图书馆,吉林长春 130021)

[摘要] 本文在简单介绍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和前人对《三国志注》的研究情况的基础上从史料价值、史学史价值和历史研究方法方面的价值三方面对《三国志注》的历史文献学价值进行了分析,认为《三国志》的注文同正文具有同样重要的史料价值。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史学史上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它与汉末以来注释家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有着明显的进步。同时裴松之发展了历史考证学。

[关键词] 裴松之 《三国志注》 史料价值 史学史价值 历史考证学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 一、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

裴松之,字世期,生于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年),卒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南北朝时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家之一。

裴松之生于世代官宦家庭,祖父裴昧,曾任光禄大夫,父亲裴珪,作过正员外郎。本人自幼好学,8岁时已学通《论语》、《毛诗》。20岁开始做官。在晋孝武帝时历任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到晋安帝时历任吴兴郡故障县(今浙江安吉县北)令、尚书祠部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执掌朝政的太尉刘裕兼领司州(西晋以司隶校尉所统辖地区为司州,治洛阳)刺史,率军北伐,裴松之为司州主簿,随军北进。晋军攻占洛阳后,松之即在洛阳任职。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宋朝。裴松之时已49岁。但刘裕认为其有“廊庙之才”,特意将其从洛阳召回江南,先后委任其世子洗马、零陵(今湖南零陵县)内史、国子博士等职,很为重用。

宋文帝刘义隆亦很器重裴松之,曾于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派遣大使16人巡行天下,裴松之为其中之一,出使湘州(今湖南湘、资二水流域及广东、广西北部,治所在临湘,即今长沙市)。巡行归来,任中书侍郎和司、冀二州(冀州,治所在今山东历城县)大中正,并被封为西乡侯。

由于裴松之学问渊博,精通史学,故宋文帝诏令他为《三国志》作注。他潜心三年,于元嘉六年(公元429年)七月完成。文帝看后,称赞说:“裴世期

不朽矣”。

《三国志注》撰成后,裴松之受任永嘉(今浙江温州以南一带)太守,因能体恤、周济民众,故境内吏民安居乐业。后为南琅砑(今江苏句容县北)太守,致仕后拜中散大夫,太中大夫。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80岁的裴松之奉命继何承天之后撰述国史,但未及动笔,便与世长辞了。

裴松之著作除《三国志注》外,尚有《晋纪》、《宋元嘉起居注》、《裴氏家传》、《集注丧服经传》、《裴松之集》等五种。只有《三国志注》流存至今,是我们研究其史学成就的主要依据。对《三国志注》的史学价值,过去有学者抱轻视态度,认为注释之文,不过附庸之作而已。这应该是肤浅之见。好的著述必须配上好的注释,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才能成为史学瑰宝,垂范于后世。<sup>①</sup>

裴松之所注《三国志》一书,为西晋陈寿所撰著,记载了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约60年间的史事,共65卷。人称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裴松之也认为其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是“近世之嘉史”<sup>②</sup>。但此书过于简略,时有脱漏,亦是公认的缺憾。因此,裴松之补注对后世殊有意义。

## 二、前人对《三国志注》的研究

第一个对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整体评价的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429

<sup>①</sup> 《〈三国志〉裴注研究》,胡宝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sup>②</sup> 《上三国志注表》、《三国志》附录,裴松之,中华书局,1982

年七月《三国志》注成奏上，宋文帝叹为“不朽！”从唐代开始，学者们对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主要针对裴注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刘知几认为，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sup>①</sup>。陈振孙认为，裴注“鸠集传记，增广异文。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sup>②</sup>叶适甚至认为，“（裴）注之所载，皆（陈）寿书之弃余”<sup>③</sup>。元代郝经从蜀非正统的角度否定了裴注，认为裴松之“绩力虽勤，而亦不能更正统体”<sup>④</sup>。《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肯定了裴注保存六朝文献之功，批评了裴注体例不纯：“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sup>⑤</sup>针对这些责难，钱大昭则认为：“世期引据博洽，其才力实能会通诸书，别成畦町。”<sup>⑥</sup>钱大昕还认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sup>⑦</sup>李慈铭则高度肯定了裴注的体例，认为“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sup>⑧</sup>。侯康则充分肯定了裴注的史料价值：“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sup>⑨</sup>

1949年以后，学者们进一步肯定裴注的史学价值。缪钺认为，“裴注搜采广博，多存异书，考证辨析，也相当精确”<sup>⑩</sup>。杨翼骧总结了裴松之对中国史学的三大贡献：一、开创了史注新法；二、开创了史料比较法并发展了史料考证学；三、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sup>⑪</sup>。此后，裴松之与裴注的研究几乎停顿了20年。20世纪80年代以后，裴松之与裴注的研究全方位展开。据统计，1983至2002年发表论文计30余篇，出版专著《陈寿、裴松之评传》<sup>⑫</sup>。

在对裴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对裴注史料的征引依然存在两种批评意见。王廷洽认为注文的价值远不及正文<sup>⑬</sup>。张孟伦认为，裴松之“屡引神奇怪异之书，以言怪诞不经之事，是迎合统治者的意旨”<sup>⑭</sup>。李晓明认为，裴松之政治思想的保守倾向导致“疾虚妄”的直书精神不彻底；反对神仙之学和神秘主义的不彻底性导致妥协和自蹈覆辙；违背自己行文简洁的主张导致烦琐的倾向<sup>⑮</sup>。相反，吴伟鹏认为，“增事实，聚异同，是裴氏撰《注》的目的，也是裴《注》的一大优点”；“引文审慎是裴《注》的另一优长之处”<sup>⑯</sup>。伍野春则认为，裴松之所引志怪小说

的许多内容是现实的折射反映<sup>⑰</sup>。日本学者林田慎之助持同样的观点：“《三国志》裴注所引用的异闻逸事之所以为裴松之征引，是因为这些异闻逸事后面反映了比逸闻本身更加深刻的历史事实。”由此认为裴松之有着“无与伦比的独自论证史观”，这种史观“与后来修撰《晋书》时将异闻逸事收入人物传记的那种风格做法不能同日而语”<sup>⑱</sup>。另外，高凯的《略论〈三国志〉裴松之注的史料价值》（《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易孟醇的《〈三国志〉裴注说略》（《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徐大英的《裴松之〈三国志注〉初探》（《传统文化与古籍整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布仁图的《从〈让县自明本令〉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史料价值》（《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李伯勋的《〈三国志〉裴注所书的史传文学价值》（《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2期）、阮荣的《裴松之对三国时期历史地理的贡献》（《运城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刘治立的《简析〈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

① 《史通·补注》（上下），刘知乙，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② 《直斋书录解題》卷四“三国志”条，陈振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③ 《文献通考》卷191“经籍考·三国志”条引马端临撰，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④ 《续后汉书》，郝经，中华书局，1985

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附录》永<sup>15</sup>等，中华书局，1982

⑥ 《三国志辨疑·自序》，钱大昭，商务印书馆，1937

⑦ 同上

⑧ 《越缦堂日记》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李慈铭，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37

⑨ 《三国志补注续》，侯康，中华书局，2007

⑩ 《陈寿与〈三国志〉》刊于《历史教学》1962年第1期

⑪ 《裴松之与范晔》载1962年7月14日《光明日报》

⑫ 杨耀坤、伍野春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⑬ 《应正确认识〈三国志〉裴注的价值》刊于《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⑭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张孟伦，岳麓书社，1983年

⑮ 《裴松之史学初论》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⑯ 《略申〈三国志〉裴注之优长》刊于《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⑰ 《陈寿裴松之评传》杨耀坤、伍野春，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⑱ 《2000年日本史学界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6期

注》(《成都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等均从史学角度对裴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批评。

### 三、《三国志注》的史料价值

首先,在政治方面,裴注在《三国志》原文注释中补充记载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如关于曹操的家世以及青少年时期的情况,《武帝纪》中只有寥寥数语,裴注引王沈《魏书》记载了曹氏的起源、地望情况,注引《曹瞒传》、司马彪《续汉书》、郭颁《世语》和张潘《汉纪》等史籍,考证出曹操的小名、其父曹腾的为官经历以及曹操青少年时期的许多轶事,从而为我们研究曹操的政治才能和性格特征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还详细记录了曹操不事董卓的言语、东归的经过以及起兵人数等内容,既扩展了《三国志》的内容,又保存了不同的说法,确实发人深思。关于曹操从军、为政时期的性格特征和从政风格,《武帝纪》语焉不详,但裴注引《曹瞒传》记载: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划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又引《曹瞒传》记载“曹操以马腾入麦中……援剑割发以置地”、棒杀幸姬及借主粮官之命以谢自己无力筹集军粮之罪等故事,为后《三国演义》所本,成为千古流传的话题。此外裴注博引《傅子》及王沈《魏书》记载了曹操勤政、勤学、才学卓识和雅性节俭的生活作风,对后人全面把握其性格特征和公正地评价其历史功绩,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关于曹丕取代汉献帝之位时的具体情况,裴注博引袁宏《汉纪》、《献帝传》等书所记载的汉献帝退位诏以及陈群、辛毗、太史水许芝等一百多位文武大臣上奏的所谓“烤图纬之言,以效神明之应”的谎言,使后人曹丕代汉的经过和威胁利诱的阴险手段有了清醒的认识。关于孟达其人其事,陈寿《明帝纪》中仅记载太和元年“新城太守孟达反,诏骠骑将军司马宣王讨之”一句,而裴注博引《傅子》、《三辅决录》和鱼豢《魏略》通过结合《蜀书·刘封传》中所涉及孟达反蜀投魏的经过,使后人得以了解孟达的家世以及其父子俩为人首鼠两端的做派。关于曹魏在官制方面实行“假辅”制度的问题,裴松之在《明帝纪》景初二年正月,“招太尉司马宣王帅众讨辽东”下注引《魏名臣奏》载散骑常侍何曾的上表和《毋丘俭志记》。由此,后人得以了解“假辅”制度实际上是曹魏时期在选官与任官过程中所实行的重要防范措施。而遍查陈寿《明帝纪》及《毋丘俭传》均只字未提。关于曹魏时期的名士孔融,《三国

志》语焉不详,而裴松之通过在《崔琰传》、《邴原传》中注引《源别传》、司马彪《续汉书》和《丸州春秋》、张潘《汉纪》以及《魏氏春秋》等书,详细记载了孔融的家族世系情况、为官经历、学问、品德以及得罪曹操后被诛杀的经过。关于如何处置罪犯毋丘俭的孙女问题,《三国志》只字未提,而裴注引千宝《晋纪》和《世语》两段详细的记载,既有助于后人了解曹魏时期族灭之刑的严酷程度,又可了解曹魏自正元年间开始实行的“在室之女,可从父母之刑,既醮之妇,使从夫家之戮”的新条律。关于曹操死后的军政格局情况,《三国志》语焉不详,裴注在《贾逵传》中引《魏略》记载了“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病,于是军中骚动”,以致“群僚恐天下有变,欲不发表。……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的混乱局面,由此使后人对曹操生前控制的“青州军”的归顺程度产生了怀疑;同时,结合《于禁传》中于禁“未至太祖所,道见十余人被创裸走,禁问其故,曰:‘为青州兵所劫’”的记载看,曹操收编的“青州兵”纪律相当松散。裴注所引对全面研究“青州兵”提供了素材。

其次,在军事方面,裴注在《三国志》原文注释中补充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如关于曹操与袁绍争斗时的兵力问题,《三国志》仅记载“时公兵不满万”,而裴松之根据袁、曹对峙的形势从战略、战术的实施角度出发,认为

“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一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胜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

从而有力地批驳了陈寿《三国志》“时公兵不满万”的不切实际的说法。关于曹魏时期著名发明家马钧的事迹,《三国志》正文无一字涉及,而裴松之在《明帝纪》中引鱼豢《魏略》记载,曾“使博士马钧作司南车、水转百戏”。裴注又在《杜夔传》中引傅玄之话,叙述了马钧发明水利灌溉设施一翻车和改造诸葛亮所造“连弩”,并尝试“以车轮悬瓴臂数十,飞之数百步”等生平事迹,大大填补了陈寿《三国志》关于马钧事迹的空白之憾。关于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孙吴在与曹魏对峙中所采取的军事伪装术,《吴书》只字未及。而裴注引千宝《晋纪》记载

“魏文帝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楨,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

可见,早在三国时期孙吴已把军事伪装术成功地运用到对敌战争中。其三,在文化和民族融合等

方面,裴注亦补充记载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如关于曹魏时期少数民族之一乌丸的史料,《三国志》介绍较少,而裴注引《魏略》和王沈《魏书》,其间涉及乌丸的习俗、种姓、户口、婚俗、生产力水平等情况以及乌丸降附内地后与匈奴同为寇害、其后又亲附内地政权的详细经过,对研究乌丸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民族的融合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关于箕氏朝鲜和辰韩等地的中原移民问题,裴注引鱼豢《魏略》详细记载了自殷商末年到秦汉末年以来,大量的中原移民为了躲避战争的侵扰而逃亡朝鲜的情况,从而为研究中朝人民源远流长的交往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关于曹魏时期太学的发展情况,裴注引《魏略》序语,补充记载如下:

“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人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麓竦,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学习,冬去春来,年年如是”

另外,在《杜夔传附子杜恕传》中,裴注亦补充了关于曹魏时期太学教育方面的史料。

其四,在经济方面,裴注亦补充记载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如关于曹魏时期陆上“丝绸之路”问题,《三国志》只字未提,裴注引《魏略·西戎传》记载,丝绸之路在汉代已形成南道与中道的基础上,曹魏又出现了一条“新道”以及西域地区焉耆、龟兹、疏勒等属国情况,从而真实地反映了丝绸之路贸易活动的发展状况。关于大秦国的情况及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作用,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补充记载了大秦的详细情况,其中既涉及大秦的历史和到达大秦的途径,又涉及大秦地理位置、人种、典章制度、物产、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与中国内地发生贸易的种类及途径,而这些史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大秦国人种的来历和大秦在丝绸之路国际贸易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最后,在社会史和人口史方面。关于汉魏时期“客”的出现,《三国志》语焉不详,而裴注引鱼豢《魏略·勇侠传》记载了自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孙宝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等四位民间著名的“勇侠”之士。其间引文中有“初平末,宝硕以东方饥荒,南客荆州”以及“鲍出字文才,京兆新丰人。少游侠。兴平中,三辅乱……客南阳。建安五年,关中始开,

鲍出来北归”两段文字,甚有深意。另《陈矫传》记载他曾避乱江东及东城,“辞孙策、袁术之命,还本郡”;《徐宣传》记载他曾“避乱江东,又辞孙策之命,还本郡”;在《和洽传》中,裴注引《汝南先贤传》记载东汉末年汝南名士许邵也曾“避乱江南”,后“终于豫章,时年四十六”。在《杜袭传》中裴注引《先贤行状》记载杜袭的祖父杜根,在东汉邓太后临政时,亦曾“密起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客,积十五年”,“邓后崩……(杜)根乃自出,征诣公车,拜符节令。”从以上几条史料看,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之后出现的“客家”一词,应该最早萌芽于东汉中期至曹魏时期。关于曹明帝时期曹魏的人口数,《三国志》仅有陈群上书明帝时所言“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而裴松之在同书同卷对此说进行了辨析,既表示了他对曹魏户口数量的疑惑和估量,又补充了关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 282 年)的户口数。同时,据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注称:“(魏)景元四年(公元 263 年)与蜀统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以此数减去同年蜀汉的降户数,则知曹魏景元四年所实际控制的人口为 663423 户,4290891 人。另据《吴书·孙皓传》裴注引《晋阳秋》记载,吴天纪四年受降西晋时,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后宫五千余人”。以曹魏景元四年与吴天纪四年的户口数相加,与《晋太康三年地记》所载西晋户数差距达 230 余万户,可见,三国及西晋时期的户口数问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关于蜀汉政权灭亡时的人口、粮食及钱财情况,《三国志》只字未提,而裴注引王隐《蜀记》则补充了详细的史料。关于“诸葛氏”的姓氏起源,《三国志》只字未提,而裴注在《诸葛瑾传》中引《吴书》记载了诸葛氏的来源、地望、迁徙过程以及诸葛瑾的治学情况,为研究姓氏起源和人口迁徙提供了佐证。总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三国志》裴松之注所补充的史料涉及到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民俗以及民族融合等诸多方面,确实对陈寿《三国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拾遗补阙之功。正因为这些原因,《三国志》的注文同正文具有同样重要的史料价值。

#### 四、《三国志注》的史学史价值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史学史上是非常引人

注目的。裴注与汉末以来注释家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有明显的不同。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sup>①</sup>

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sup>②</sup>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注解不过是附带的工作”。

在中国史学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占有特殊的地位。宋文帝对裴注的赞扬并非溢美之词,从广辑资料,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保存大量珍贵生动史实的意义来看,《三国志注》的功绩确实是不朽的。裴松之所引用的魏晋人的著作多至二百一十余种,除去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书籍,尚有一百五十多种。这些书籍收入到《隋书·经籍志》中的不过四分之三,到唐、宋以后,则十不存一了。裴注所征引的材料不但面广,而且首尾完整,不似其他引书那样割裂剪裁,断章取义,尤为重要的是裴注还保存一些亲身见闻的资料。如《齐王芳纪》注引《搜神记》载魏明帝“诏三公曰:

“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

“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也。”

裴注与汉末以来注释家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有着明显的进步。

## 五、《三国志注》在历史研究方法方面的价值

在裴松之以前,注家大多以采取解释音义、名物、地理、典物等方法为史书作注。如马融、郑玄注《尚书》,贾逵、服虔、杜预注《左传》,贾逵、韦昭注《国语》,高诱注《战国策》,徐广注《史记》,服虔、应劭、韦昭、晋灼、蔡谟注《汉书》等。而裴松之的注文,不仅包括上述内容,而且增加补阙、备异、惩妄、论辩等名目,遂为注书开创了一种更加完备的体例。注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提供史料,而且这些史料

都经过了注家的精心审核,从而使人能够较多地了解历史真象。无疑,这样注史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清人钱大昭认为注史与注经不同,注史应以达事为主,叙事不清,训诂再精也解决不了问题。他称赞裴松之注书博引载籍,增广异闻,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读者昭然可见。但这样注史颇费功力,除注家精通原书外,还要熟悉其他史籍,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自己的研究与见解,有综合、分析、考据的能力。后世不少人仿效裴注的体例进行注史,如宋人王暉的《庸余录》,陶岳的《五代史补》,清人彭元瑞的《五代史记注》,吴士鉴的《晋书斟注》但其成就皆不及裴松之,大约与不具备上述的条件有关。

杨翼骧和杨耀坤都认为,裴松之发展了历史考证学。考证法是中国传统史学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从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征引东晋孙盛《异同杂语》的内容可知,孙盛也曾在其书中对许多史事进行了考证。令人遗憾的是,此书早已亡佚。所以我们说,在历史考证学中,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的考证内容是保存至今最早的完整记载。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丰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因此,他在注《三国志》时,将魏晋之际有关三国历史诸史书中“纰缪显然,言不附理者”注册于《三国志》的同人、同事之下,并对这些内容以及《三国志》中的错误记载进行了考证,“以惩其妄”。伍野春的《裴松之的历史考证法》根据裴松之《三国志》中的141则考证,归纳、分析其方法并阐述其特点和源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根据有关人物行年的活动考证史实;(二)根据有关人物的年龄考证史实;(三)根据有关人物的职官考证史实。这是目前惟一专题探讨裴松之历史考证法地位和方法的论文。该文认为,裴松之的历史考证法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历史考证法”,<sup>③</sup>其具体考证方法如根据有关人物行年活动、年龄、职官以及社会调查所得考证史实,对无法考证的史实采取存异或注明“未详”。

可见,裴松之在发展历史考证学方面作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附录》永瑤等,中华书局,1982(2)

② 《三国志补注续》,侯康,中华书局,2007

③ 《裴松之的历史考证法》刊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2期